

民族主义与国家安全

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局与国际关系

MINZU ZHUYI YU GUOJIA ANQ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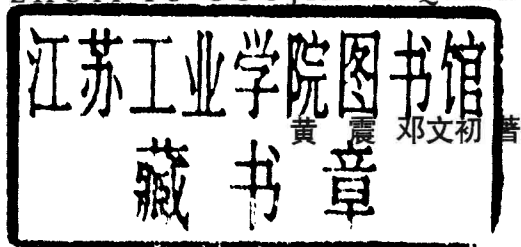
黄震 邓文初 著

团结出版社

民族主义与国家安全

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局与国际关系

MINZU ZHUYI YU GUOJIA ANQU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主义与国家安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政局与国际关系/
黄震, 邓文初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80214 - 445 - 3

I. 民… II. ①黄…②邓… III. 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研究—中国—民国 IV. D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5537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010)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123456@tjpress.com(出版社)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65244790@tjpress.com(投诉)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装订: 三河市中门辛装订厂

开本: 147 × 210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89 千字

印数: 1000

版次: 2008 年 5 月 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0214 - 445 - 3/D · 88

定价: 18.00 元 (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引 论	(1)
第二章 分裂的世界	(22)
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25)
二、第三国际体系	(33)
三、地缘因素(1)	(39)
地缘政治因素之一：苏俄	(40)
苏俄与吴佩孚	(42)
苏俄与孙中山	(46)
四、地缘因素(2)	(51)
第三章 统一的努力	(56)
一、南征还是北伐?	(59)
广州政府	(59)
北京政府	(67)
二、组织与动员	(74)
被规训者	(78)
规训者	(93)
三、本章结论	(99)
第四章 组织与事件	(109)
一、群众	(112)
二、总工会	(121)
三、党部	(136)

四、本章小结	(147)
第五章 事件与解释	(153)
一、南京与东京	(156)
二、中东路与苏联	(173)
三、中东路与日本	(181)
四、本章小结	(186)
第六章 结论	(194)
参考文献	(209)

第一章 引 论

民族主义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成为国际政治、历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流风所及，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研究，无论从论文论著的出版，还是研讨会的召开角度看，也是蔚为大观。以民族主义为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在近五年时间达 59 部。^①由此可见，民族主义研究已经成为社会潮流与学界的新宠儿。

但也正因为作为一种时尚，民族主义，无论是在社会思潮的波动层面，还是在学术研究的建构层面，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理性回应与反思。“民族主义”成为一种社会与学界的“众因之因”，诸凡现象都可以在“民族主义”的框子里得到解释。学术研究的时尚化，随着“民族主义”话语的流行而趋于混乱。作为一种非学术的，无法精确界定的术语，“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在学术研究领域是否还有价值？这样的疑问，已经成为学界无法回避的问题。

回顾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我们发现，对民族主义的界定与分析，所关注的重点与解释的框架，是与中国近代史，尤其思想史研究的整体范式转型无法分离的。随着近代中国史研究范式由革命史框架向现代化框架的转化，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分析也经历了这一转型。在 20 世纪最后几年，近代中国史研究范式中出现由现代化向后现代范式的转移，民族主义研究又进一步趋向，采用了这一分析模式。在这种研究范式的“腾笼

^① 依中国期刊网“全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1—2006 年度统计。其中硕士学位论文 44 篇，博士学位论文 15 篇。在 1999 年至 2006 年间硕博学位论文涉及民族主义这一主题的，为 3598 篇。

换鸟”游戏中，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也由早期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向“民族国家建构与认同”移动。如果反思这样的“范式变革”的动因，我们很难在其中找到“民族主义”研究内在的理据，变革的动因，最终总是存在于思想史以及作为思想史研究框架的近代中国史的解释框架中。这种研究范式的“腾笼换鸟”游戏给“民族主义”研究的学理化造成诸多困境，也一再引发学界的反思——民族主义，或者思想史研究是否拥有自身的解释框架？没有自身解释框架的学术研究如何可能？如果要建立一个自足的解释框架，这一框架的建构应在什么层面上展开？显然，这样的考问，与其说是针对“民族主义”这一具体问题，不如说是针对思想史的整体研究状况更为妥当。

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思想史研究如何可能？

对于这样的“元思想史”问题，学界的讨论已经初露端倪。^①本文不准备做纯概念的分析，只针对本论著所关注的论题“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现状，做近乎经验式的观察。

（下面的讨论不准备作系统的学术史分析——在一个学术出版泛滥的时代，学术史分析在整体上已经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与其将有限的精力耗费在鱼龙混杂的各种文本中，不如只关注问题的重心所在。因此，本文的展开并不回避个人选择性所造成的偏颇与遮蔽等困难。）



近代中国思想史兴起与衰败，与学术队伍聚散有关。进入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学人，大多是跨门甚至是破门而入，由文学、哲学、

^① 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本集是以“思想史的元问题”为主题的专题论文集，可以认为这是国内思想史界对自身研究领域反思的开始。

政治学进入的较多，纯粹由历史学界进入的为数较微。跨学科进入为思想史的兴起凝聚了新锐势力，也提供了界外理论的丰富资源。但也由于其界外凝聚的方式，使思想史研究脱离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撑破了）近代中国史研究长期反思所积累的诸多共识，尤其是对近代史学体系整体框架的反思所达成的共识。近代中国思想史，因为这种“界外阑入”，不再局限于“近代中国史”的平台之上，而成为一种“普遍历史”关照之下的思想史。这种微妙变幻，从思想史的社会影响力角度讲，却也算一种“功德”，而如果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与问题凝炼角度看，却值得再思。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之后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兴衰，与这种“界外阑入”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文不准备就此问题全面展开，仅解剖几个个案，并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展开的方法论纲领。

相对而言，余建华的研究在这方面具有清醒的问题意识，他不仅辟有专章讨论民族主义与国家建设的关系问题，而且在其中设有专节论述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同调与紧张。^① 在世界近代化的整体运动方向上讲，现代化进程与全球民族主义演进在“时空上具有广泛的同步性，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已成为20世纪人类社会并驾齐驱的两大历史潮流”。^② 尤其在第三世界中，民族主义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民族国家的建构为现代化提供了前提与基础，同时也是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动力。同时，民族主义也为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转型往往会出现的“程度不一的认同危机和社会阵痛”，“提高了一个有凝聚力的新认同，从而保证社会统一与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消弭或缓和这些国家常见的传统和现代二元

① 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2—76页。

② 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第72页。

结构的冲突”^①“民族主义，在为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社会中是一种实现现代化的力量”^②。

同样，余建华并不否认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紧张，他认为：“民族主义淹没了现代化过程，此外，由于民族主义与传统的亲和及其对西方的拒斥，局限了现代化目标的全面推进，而沦为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当然也包括一部分民族扩张主义导致的现代化整体的崩溃。”^③

余建华的分析基本上还是西方理论的介绍，主要是对布莱克《现代化动力》思想的引介，并没有内化为近代中国史之分析的基本内容。但这种“普遍”历史的书写，是否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阐释框架？近代中国历史，是否仅仅作为世界现代化历史的一个分支而存在？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在近代中国史研究中预先建构自己的整体框架，思想史，也包括其中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就无法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阐述平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毕竟其主语是“中国”。

哲学史学家张汝伦可以说是跨门而入，并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一个学人，2001年，张汝伦出版了《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为思想史研究拓展了不少新话题。在书中，他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作了明确界定：“民族主义不仅是近代中国一切现代化的基本动力，也构成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现实形态或意识形态。就像进化论世界观一样，民族主义可以为在其他问题上立场、观点迥异的人所认同。”^④对这一总题的阐述，张汝伦的观点可以分化为以下几点：1. 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动力之源；2. 民族主义超越意识形态、地域与种族、利益的分裂，而成为近代中国的最高

① 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第74页。

②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③ 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第76页。

④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价值诉求；3. 现代化路径设计的不同，仅仅是在民族主义大旗之下的分野，与民族主义的目标并不发生冲突；4. 民族主义构成了中国的现代性的主要因素，而在全球看来，由于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民族主义将仍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促进的力量。

其实，如果张汝伦能够多关注近代史学界，尤其是西方中国近代史学界近20年来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也许可以发现，作为一种价值或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取得张汝伦所说的超越各种意识形态、地域与种族、利益的分裂的最高价值。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着对抗民族国家建构的诸多潜流，“封建的”、“自由主义的”、“地域主义”的等等力量，在同“民族主义者”的力量角斗中，他们的历史，为“民族主义”者军事——政治层面的成功所抹杀与遮蔽。国内学界对国民革命期间民族主义口号之下的各种力量对比以及争论、冲突与决战的分析，基本上突破了革命史学建构的“反帝反封建”的宏大主题，“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无法作为跨越各种“立场、观点”的共识被认同。美国中国史学家杜赞奇也已做了“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工作，从民族主义的口号之下发掘了被抹杀的“封建主义”、“联省自治”等声音与力量；费约翰的《唤醒中国》，对国民革命过程中，民族主义势力与地域主义、自由主义的冲突以及最后被规训的过程有精彩的分析。^①

其实，在张汝伦自己的论述中，尤其是他所引的几节文字中，已经反映了对民族主义价值的反思与批判，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 建立以现代化为标准的评判体系，民族主义必须纳入这一体系中认同；2. 现代性的理性应该优于民族主义之情感诉求；3. 国家、国际安全对民族利益的胜出；4. 国内民主政治、个人利益的诉求

^① 以上参见罗志田、冯筱才、王奇生、杜赞奇、费约翰等研究成果。

对全体利益、政治专制的胜出；5. 政治判断的最终结果对政治正义、政治运作手段的胜出等等。

但张汝伦似乎忽视了他所引用文献与其结论的抵触。同时，他也忽视了自己的写作本身就是针对当代民族主义论争中的喧嚣而发。这种喧嚣展现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思想界与学术界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纷争与混乱，支持还是批判、反思与重建的话语实践，本身就意味着“民族主义可以为在其他问题上立场、观点迥异的人所认同”只是一个神话，民族主义原则并不是绝对价值。民族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一个整合所有认同的超级忠诚对象，在当代，民族国家已经建立的时代尚且如此，在民族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下，尤其是在国际势力错综复杂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自明的意识形态，相反，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建构的对象。

在这种“普遍历史”的抽象关照之下，研究者有时会“有意”遗忘作为“普遍历史”源头的西方世界历史内在的张力。涉及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复杂关系时，历史的张力被抽象思辨抹平了。正是借助这种被“抹平”的思辨历史（可以说这种被抹平的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由民族主义话语所建构的历史），“民族主义”获得了绝对的价值附加，从而，西方“民族主义”历史才得以成为“普遍历史”。很显然，这样的研究取径乃是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在逻辑上是无法得到认可的。但不可否认，这样的逻辑却正是目前思想界的共同操作范式。关于这一点，我们仍以张汝伦为例。

张汝伦在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为理由而否认民族主义之正义性时，就是以“民族主义”所建构的话语为证据，论证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与个人权利追求并没有冲突，而是内在的同构。他论证所采用的文本，是民族主义理论创始人卢梭的

论说与演讲。^①

作为“现代民族主义之父”的卢梭，它的理论真的与个人自由同构吗？西方思想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已经提供了足够的理论资源，不烦本人赘述。此处仅举 Roy C. Macrids 《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一书对这一问题的阐述：

Roy C. Macrids 在《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中，对卢梭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作了极为简单的分析，他认为，正是卢梭的“普遍意志”将我们直接引导到群体精神与民族情感的振奋状态，而“普遍意志”，在卢梭那里，是指全体人民的意志，但是，普遍意志要成为全体人民意志，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那就是，人们必须是统治者并且能按照理性行动——而这要求他们能放弃他们直接的与切身利益，并像一个社会存在物一样将整体利益置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上。要使普遍意志成为可能，就必须是共同体中的全体人民达成一致，卢梭认为，只有民族主义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民族主义”通过在全体人民中注入相同的价值、情感，通过对团结主题的一再强调，通过教育、仪式，甚至有时要使用强制性的共同体约束，强化这种共同的存在感觉等等手段，将全体人民型塑为一个整体，从其中产生一个共同的表述框架，从而可以达到意见一致，产生所谓的普遍意志。^②因此，Macridis 提出，“非理性与民族之主题的发展，换言之即所谓的民族之上的强调，导致了对个体的压制”。^③而以卢梭思想资源为动力的法国革命，可以说是“以个人自由与人民主权始，以个人独裁与民族扩张终”。^④

① 张汝伦：《中国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8 页。

② Roy C. Macrid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 Movements and Regimes*, Fourth Edition, Boston Lonton: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9, pp242—243.

③ Roy C. Macrid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 Movements and Regimes*, Fourth Edition, Boston Lonton: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9, p242.

④ Roy C. Macrid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 Movements and Regimes*, Fourth Edition, Boston Lonton: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9, p243.

赫尔德民族主义与德国之对外扩张及法西斯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剥夺等有着微妙的关系，此处没有必要展开。^①我所关注的问题，自然不在这里，而是，“民族主义”的学术研究，如果被放在由民族主义话语所建构的历史体系中来展开，历史研究如何避免论证上的逻辑循环？也即，如果不对“民族主义”话语本身的历史进行清理，而在由“民族主义”话语所建构的历史领域中，进行民族主义的讨论，这样的学术讨论如何可能？

二

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思想史的解释框架往往得自一般通史（政治史）。思想史操作层面的一些结构性预设，来自思想史体系以外的历史研究领域。如果思想史研究者没有充分的反思意识与批判态度，在对史实进行分析解读时，就容易以这些结构性预设为依据，以其所夹带的价值为据，在解读历史事实时，将研究者所处时代的价值投射到历史语境之中。这种在历史之中读出自身时代信息的历史解释学困境，是制约历史学之“客观性”的方法论困境，是造成历史解读中的时代错置的原因。而这样的困境，几乎是思想史研究无法避免的困难。

以王立新的博士后研究课题《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为例。尽管王立新是从外交史的角度切入的，而且也基本上不是一种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但在论及美国在“关于危机”对待孙中山的态度时，王立新却不自觉地犯了“时代错置”错误：在指责美国政府拒绝对孙中山的认可时，他指出“他们（美国政府）不明白，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才是中国持续动乱的根

^① 参见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133页，第147—148页。

源，20世纪中国需要的不是渐进的改革，而是异常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孙中山正是这场革命的核心和代言人”，^① 他指责美国在对待中国不同的地方力量时忽视孙中山，无视孙中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领袖，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在他的背后千百万已经觉醒的中国民众；而地方军阀只代表他自己”。^② 这种正统史观下的价值判断，作为对美国政策的批判，在王立新的研究中，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但如果他在做这样的判断时，能稍微降下视线，注意一下当代人对南北不同势力的观察，也许可以避免这样的时代错置。^③

当时的《申报》主笔杨荫杭对南北分裂下的不同势力有一个结语，认为他们表面看仿佛是“主义不同”，但“自吾辈视之，则同为武人之盘踞而已”，“吾侪小民，对于被犯罪分子朽败，固不能表同情，然对于南方人物，论起以往之成绩与今日之涣散之势，亦不在崇拜拥戴之列”。^④ 而就是“代表中国的未来和希望”的孙中山本人，也不知道自己代表着谁的命运，他甚至连自己以及国民党的出路都无法把握，他在1924年9月9日给蒋介石的信中，就提出“在粤有三死因”，不得不另谋出路。而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甚至都不知道北伐能否成功，事实上，北伐的胜利实出于南方国民党军的意料之外。^⑤ 在历史现场，又如何证明孙中山代表着“中国

① 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② 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第248页。

③ 对民国前期，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南北各势力的观察，可以参阅邓文初：《对手相看两了然》，《博览群书》第8期；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④ 1921年8月20日《申报》，杨荫杭：《老圃园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

⑤ 罗志田对此有详细的分析，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91—193页。

的未来和希望”，即使美国在制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时，违反常识地以中国的利益为出发点，他也面临着确定谁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的问题，毕竟，孙中山的身上并没有标明自己是“真命天子”。

以上这样的“时代错位”，只是在旧的近代中国史体系还余威犹存情况下的产物。相对来说，由于中国近代史的旧有框架（革命史体系）已经崩溃，而新的框架又没有建构起来（现代化体系尽管已经取得优势，但并没有最后取代革命史框架，而且，现代化体系也没有提出一套具有操作性的方法及示范性的文本。而对于受近代中国史学专业训练的学者来说，“普遍历史”框架又是无法得到整体认同的），时代错位的问题反倒不再是一个主要的史学困难。历史研究面对的是作为普遍历史的现代化之价值体系过于强大的覆盖能力，这种覆盖不仅遮蔽了近代中国史的“中国”这一主体性，同时，也以其话语霸权，强行宰割了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以适用现代化价值的合法诉求。现代化体系的引入给近代中国史研究所带来的问题，与革命史框架造成的问题并不少，也许甚至更为严重，而它所引发的问题比之他所解决的问题，似乎也是不成比例的。

如何面对这种整体历史崩溃之后的历史叙事的困境？史学家唐文权的处理方式可谓独特。在《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唐文权干脆回避这一问题，而采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种态度，来处理由于历史叙事的整体框架崩溃所造成的困境。他直接申明自己的观点，对于民族主义而言，“相对偏重申论其灌溉之利，而非泛滥之害，这是因为作者相信那位睿智哲人的名言，存在的便是合理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流行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时代的正义性”。^① 也因为基于这一价值判断，他对近代以

^① 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描述与分析是充满激情的，“政治民族主义的曲折发展，有力地刺激社会各阶级阶层对外来民族的挑战做出反响回应”，“经济民族主义的长足进步，保证了民族资本成长发育所必备的条件”，而文化民族主义则孕育“现代民族性文化”，“是民族振兴不可或缺的精神基础”。^①

基于这种坦诚的价值诉求，民族主义的“正义性”自然就不须证明了。但这样的价值坦诚，能遮蔽却无法解决历史过程中留下的问题——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无论是思想与理论建构，还是政治运动，都是一个纷繁复杂、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纠结体：民族主义，究竟是救国还是害国，是维护了中国国家的统一还是破坏了中国国家凝聚力的根基？民族主义，是被各种政治力量利用的意识形态，还是出自国民的自发利益与情绪，是导致中国民主运动失败的罪魁祸首，还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推动力等问题，并没有因为这种价值坦诚的申明而消失。这种价值的确立，也造成历史研究的认识论困难即：将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概念当作一个透明的同质概念来处理；将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当作一个统一的向心的民族凝聚过程；将民族主义的正义性当成政治运动过程中的有效性来认同；并将中国国家独立的最终完成归因于民族主义运动。而本来需要论证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学问题，反倒消失了。作为学术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从而被近代中国史的整体叙事所取代、所遮蔽，并最终被取消。这样的“民族主义”研究，其实仅仅是对“近代中国史”宏大叙事的“深化”或者称之为“具体化”，这样的研究思路，仍然是“以论带史”式的演绎。在这种历史研究的“演绎”逻辑之下，历史研究如何可能？

当然，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史家，是无法忍受这种纯粹思辨式的历史研究法的。要解决这一困难，需要在方法层面上有所突

^① 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第280页。

破。这种突破，便是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类型进行划分。二者是确保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正确性的技术之一。

建构民族主义正义性的一个基本手法是将民族主义分为两种对立的类型，唐著对莱特民族主义与战争的四种关系类型做出修正，而将之概括为“一为弱小民族或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或国家主权而从事的民族解放正义战争，一为强大民族或国家为扩张侵略而从事的帝国主义非正义战争”。前者属“防御自卫型”，后者属“进攻征服型”民族主义。^① 这样的分疏所建立的分析框架，虽然确保了民族主义的政治正义性与合法性，但却遮蔽了民族主义的另两层面相：作为20世纪人类共同的社会思潮的民族主义的可能的共生关系；以及作为社会及国家政治整合过程中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分离与抗争。而后两者，由于思想史界与历史学界、政治学界有意无意地忽视，也就是本文所要挖掘的重点。

当然，唐著也提出了几个问题，民族主义与近代化的关系；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的关系；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是必须继续加以思考的命题。

例如，在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方面，唐文权的研究就只能在“余论”中占一席之地，而且不得不极为谨慎。唐著提出，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与现代化是同步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广泛的互为适应兼为所用的关系：“民族主义的方式成为中国适应现代化极为合理的途径。民族主义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为己任，它通常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触发剂和推动力量，为社会变革提供必要而又充分的政治、道德以及思想、文化等多种能量”，同时，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是民族主义的目标。^② 但也不否认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紧张：救亡图存与富国强兵之目标的分野，造成了“一种矛盾

① 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第286页。

② 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第281页。